

編者的話

樂觀正視中梵關係與中國教會未來

近日中梵關係談判的新進展重新吸引到公眾的注意。事實上，自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1978 年肩負起教會首牧的重任以來，梵蒂岡一直嘗試打開與中國的交談大門；但教廷亦一再強調本身並非以建立外交關係為目的；教廷的終極目的是幫助國內教友，包括地下的及地下的教友群體，使他們的信仰生活空間能得到正常化；並擴大傳教空間，好能向大多數未有信仰者傳播福音。

可以說，外交關係只是教廷達成上述目標的工具，並不是教廷的目的。如果有傳媒推論教會為外交關係而犧牲教友群體，則是這些傳媒受困於世俗國家的博弈論思維而忽略了天主教會的特性。

然而，有關中梵雙方可能達成主教任命問題的協議，卻離奇地引出鋪天蓋地而來的傳聞及內幕消息，這不但引發各地教會內外的人士不同程度的憂慮，為當事人亦產生許多不必要的困惑。事實上，許多海外人士對中國教會，特別是有關地下教會的認知，與身處其中的地下教會人士，有甚大的落差，以至近日中國齊齊哈爾教區魏景義主教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要作出強烈要求，「我衷心希望，中國大陸以外的友人，包括港澳台世界各洲，不要代表中國的地下教會發聲，因為你們代表不了地下教會。」（參閱《公教報》2018 年 2 月 25

日第 3862 期, 頁 1)

的確，太多海外雜音已使到公眾人士忘記了普世教會三十多年來的努力，以致有錯覺以為最近的发展是教廷在政策上的急轉彎。

說到底，中梵之間，目前尚未到達談論「具體外交關係」的層面，只就主教任命問題可能達成「共識」而已。

筆者一再在不同場合指出，習近平主席於 2013 年上任以來，國內再沒有出現任何「未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這一點是非常善意的表現，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珍惜。

當然，過去五年「已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亦舉行不多，一共只有五次祝聖禮得到政府當局的「綠燈」；2015 年有一次，2016 年 4 次，2017 年卻一次也未有。

目前雙方也許可以完成一個框架性的協議，去解決困擾多時的「非法主教祝聖問題」，以確保未來的主教人選，不會是雙方所不能接受。在這樣的協議之下，教廷未必能任命最心儀的人選，但同時也可以得到中方的保證，不會出現教廷所不認同的人物，這雖然尚未算完美，但起碼是可以接受的中庸之道。

事實上，類似的協議一直存在於教廷與歐洲一些國家之間。2017 年中一位來港探訪我的奧地利籍大學教授表示，奧地利政府對國內主教的任命一直保留類似的反對權，只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直未有動用這些權力而已。

主教問題得到解決之餘，目前國內最後七位非法祝聖的主教的去向問題也必須處理。據我所知，他們起碼在 2015

年或更早之前，已各自向教宗呈函表達悔意及請求原諒。

過去三十年以來同樣的「請求原諒」個案起碼有 65 宗，佔所有「非法祝聖」事件的三分之二。而誠懇的申請者普遍都能得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寬免。

至於他們所獲寬免的程度是僅僅寬免其罪行，抑或尚批准其保留教區主教身份，抑或更進一步對他們有其他任命，則要按個別的案例實況去處理。

現今，教宗方濟各經過長時間仔細聆聽了各方面意見，包括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的多次申述意見之後，所總結得來的結論，應該是值得我們所尊重及服從的。

筆者前面所引述《公教報》的訪問中也有提及，魏景義主教也鄭重聲明，無論中梵關係如何走向，他及其團體都完全服從教宗所做的任何決定，且不問理由。這是非常標準的天主教牧者對宗座信任，也使我感到由衷的敬佩。

林瑞琪，2018 年 2 月 26 日，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